

当记者遇上经济： 承载能量超乎想象

在时代的进程中，记者不只是记录和报道者，而且还是创造者、发现者和思想者。

■ 本报记者 汪静赫

2012年11月8日是第十三个记者节。这一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职业所能承载的能量，远远超过公众的想象。

创造者—— 道琼斯指数改变世界金融

1872年，马萨诸塞州最好的阳光照在了21岁的穷小子查尔斯·亨利·道(Charles Henry Dow)身上。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党人报》找到了一份工作，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当记者。此后的几年里，只有小学文化的查尔斯·亨利·道辗转几家报社，成长为一名优秀记者。

1879年，他如愿来到纽约，成为专门报道金融的记者。

目睹股票价格经常在华尔街联合投资者们控制、垄断下引起的暴涨和暴跌，查尔斯·亨利·道觉察到急需一个“更好的、可靠的财务报告”，他预测“有一种可以衡量那些工业巨头正在做什么的方法，来把握金融市场总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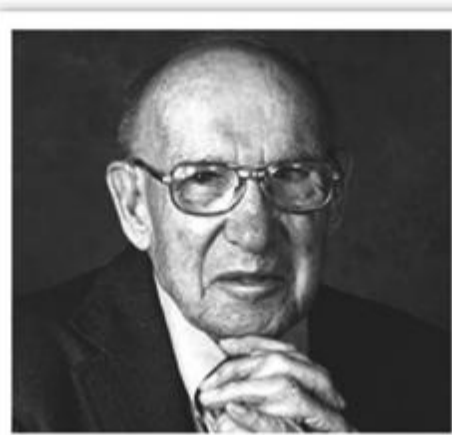
1882年11月，查尔斯·亨利·道和另一位年轻记者爱德华·戴维斯·琼斯创立了道·琼斯公司。同为记者的查尔斯·博格斯特莱斯在三个月后加入。

1882年底，道·琼斯公司将华尔街金融信息手写在劣质纸上，定名为《顾客晚报》。这份只有两页的晚报迅速取得成功。查尔斯·亨利·道随后发现股票市场急需一个“反映总体走势的晴雨表”。1884年7月3日，他在《顾客晚报》上首次刊登了一项包含11种股票的指数，其中包括9家铁路公司和两家汽轮机公司股票的平均价格，指数一经推出，就迅速被华尔街所接受。道·琼斯指数就此诞生。

后来，查尔斯·亨利·道又发明了“工业平均指数”，即当时被认为投机性最强的12家工业公司股票的平均收盘价，并于1896年5月26日首次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

道·琼斯指数成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股票指数。目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的30种成分股是美国蓝筹股的代表，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财务指标，而是世界金融文化的代号。

查尔斯·亨利·道这个100多年前的年轻记者，用一个念头改变了华尔街，而且至今影响着全世界。



发现者—— 女记者开启安然覆亡之路

大约在2000年年初的某一日，美国《财富》杂志记者贝萨尼·麦克莱恩(Bethany McLean)初次看到安然(Enron)公司报表的时候，也许手边还有一杯刚煮好的咖啡——那应当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这位做过高盛公司分析师的漂亮女记者，当时还未曾料到她即将撬动一桩美国史上最大的公司丑闻。

贝萨尼对安然公司“过于完美”的报表产生怀疑，并引发了调查的兴趣。

报道震惊美国。以她为开端，其他记者持续跟进，安然公司的黑幕被调查记者们一一暴露于公众面前。

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在破产申请文件中安然公司开列的资产总额为498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纪录。作为安然丑闻中获刑最重的涉案人，前CEO杰弗里·斯基林因欺诈等罪名被判处24年零4个月监禁。

安然公司在如日中天之际的突然崩溃，引发了美国公司接连爆出丑闻的“多米诺牌效应”，华尔街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大牛市”也由此结束。

记者的价值：不仅仅报道事实

■ 李锦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传播生态与信息产业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在其影响下，传统新闻传播方式、传播效果、评价标准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下，记者的职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身为一名记者，又该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

移动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方式的普及，速度异常迅猛。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达5.38亿，这种冲击速度之快，带来变化之深刻，是十多年前未曾想到的。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个“全民记者”时代。所谓“全民记者”时代，就是自媒体时代，一个人可以运用电脑、手机等网络平台参与信息传播的时代。例如最近网络上纷纷扬扬的“表哥”事件，正是网友在一张偶然的视察照片中发现新闻线索，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对腐败现象给予了揭露。可以说，这就是“全民记者”的一种行为体现。

2009年3月，我以一封万言信上书温家宝总理，引起连锁反应，甚至改变国家信贷走势。正是因为互联网给我

这个在体制内已经提前步入赋闲阶段的老记者带来了第二次新闻生命。

互联网的兴起也给我的新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蜕变与升华，为我提供了另一个施展新闻才能的场所。我写博客已经四五年了，写博客要有人看，又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价值追求。而且互联网快速传播新闻的能力使我能够在最短时间了解到经济形势变化，网友的畅所欲言也给我以启发，这些都为我写万言信打下了基础。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的主见能自由地呈达上面。可以说，没有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的快速，并打破体制的封闭性，就没有万言信的成功。

由于互联网开放性、互动性、虚拟性等特点，现在的新闻传播愈来愈呈现出自由、平等、竞争与民主的倾向，这是互联网时代对待新闻的最大冲击所在，也是价值所在。网络新闻为民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渠道，为民众的政治参与营造了新的公共空间；培育了民众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增强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强化了民主监督的效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网络本身虚拟性等特点，也凸显出了一些问题，如虚假信息和网络民意的非理性张扬等。这就需要新闻宣传管理部门的有力引导与

规范。

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人民网强国论坛，这可以视为网络引起最高执政者高度重视的标志。在这稍前阶段，很多地方领导视网络为“洪水猛兽”时，总书记把网络引导能力当做党和国家的执政能力来看，开拓民意诉求渠道，让老百姓有更多话语权，这反映我们党走向民主的勇气和决心，表面看是新闻文化界的事，实质上是中国政治民主的重大标志，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

今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就包括财经评论员、知名博主。体现出中央对于网络舆论的重视。

互联网是技术，是载体，而内容是根本。好内容加好技术，这是方向。内容在前，技术在后，不可本末倒置。新闻媒体适应互联网时代，要借用互联网技术，但是根本的东西借用不了。传统媒体人要看清楚一些，现在的新闻竞争是体制打破了，打开了围墙，在同一天地地竞争，最重要的是内容的竞争。新闻内容的价值标准起变化了。

新闻前辈范敬宜曾说过：“离基层

一份让人看不懂的报表，很可能就是一个有问题问题的报表。”贝萨尼认为。

思想者—— 记者不只是时代的记录者

“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倾听。”——这句话总结了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的地位。这位“现代管理之父”的第一份职业正是新闻记者。

如果说彼得·德鲁克用他的睿智思想改变了世界，那么在中国，新时期经济进程中，也离不开有独立思想和创新精神的“学者型”记者。

“时代变了，现在的记者不再只是充当耳目喉舌，而要有头脑，有思想，互联网时代，记者应当再造新的价值。”著名记者、现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

作为记者，李锦以擅长调查研究闻名于业界，成为中国智慧型记者的代表人物。

自1978年起，李锦从事农村调查30年，由他采写的来自农村基层的调查文章曾得到38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或赞扬。1982年，邓小平听取汇报农村改革情况并对其作出“你有发言权”的评价，这一幕后被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再度呈现，而李锦也成为片中唯一出现的新闻记者。

1995年，李锦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调查研究58天，写出长篇论文《资本经营论》，对“资本”概念进行重新定位。2009年，李锦写出近万言意见书寄给温家宝总理，提出“正在出现的信贷大跃进极易引起泡沫经济，如果不及时抑制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货币的灾难”。收到李锦来信的第11天，温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优化信贷投向，使资金真正落实到支持实体经济运行上。

在新时期的中国经济进程中，一些富于思考、勇于创新的记者已经不只是冷静敏锐的旁观者，而是以他们的睿智思想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并由此迸发出超越记者职业的巨大能量。

“对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对国家重大课题的破解力以及社会进步的引领力，这三种能力是新时期中国记者应当再造的新价值。”李锦说。

“自媒体”时代来临，记者的职业精神、自律意识、专业水准和公信力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在声音多元、舆情复杂的今天，更要捍卫记者的职业操守，更要以扎根基层、报道事实、还原真相为己任。如果一个记者仅仅是在网上搜索二手新闻，不去了解真相，长此以往，将会是整个新闻行业的痛楚。

一个媒体、一个记者在互联网时代要适应和学习互联网，提高和充实，要创造价值、引领互联网。应该说互联网时代是媒体人才价值再造的时代，媒体新的价值形成的时代。作为记者，我们应该走进互联网时代然后引领这个时代，追求发现思想、引领社会的价值，成为“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与社会进步的引领力”，这种价值追求已经突破了体制的约束，是互联网时代体制内外共通的普遍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互联网时代，创造一个崭新的空间，形成新的影响力。

可以断定，今后十年，新闻媒体发生的最大变化，必然与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价值创新有关，因为我们已经走进这个历史门槛。

(作者：著名记者、《中国企业报》总编辑)

人物

黄如论： 继造桑梓之麻祯



他出身名门，却自幼家境贫寒，他早年赴海外谋生，不惑之年应政府之邀回国投资。至今，他捐资公益慈善事业达41亿元，平均每天捐出53万元，平均每小时捐出2.2万元，连续七年荣获“中华慈善奖”。

■ 钟浅鸣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慈善家。他出身名门，却自幼家境贫寒，他早年赴海外谋生，不惑之年应政府之邀回国投资。至今，他捐资公益慈善事业达41亿元，平均每天捐出53万元，平均每小时捐出2.2万元，连续七年荣获“中华慈善奖”。

他被誉为“中国的卡耐基”的黄如论。

“我来看一下福建人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0年，福建企业捐款遥遥领先，它GDP是第11、12名，但是它(捐款)遥遥领先，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经济学家何志毅在“2012第十届华人领袖(上海)峰会”上所作的演讲。他还曾提到，为什么福建没有王家大院、乔家大院，却有厦门大学、集美学校？或许，这正是闽商独特之处。

闽商对于慈善公益的执着由来已久。他们的谋生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却不约而同地在发达之后，回到家乡捐助教育、发展医疗、修桥铺路。他们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不是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家乡父老做了多少善事。随着时代发展，闽商致力公益慈善的范围也日益开阔，除了造福乡里，非典疫情、汶川地震、西南五省大旱，乃至成立各种慈善基金会，都有闽商急公好义热心捐助的身影。这个群体中，涌现出很多慈善家，稍远的说，有著名侨领陈嘉庚、李光前、胡文虎等；从近的说有曹德旺、黄如论等。

这些人中，黄如论身上汇集了很多闽商的特点，比如家境贫寒、白手起家，比如早年出国谋生，靠诚信、勤奋和远见掘得第一桶金，比如将造福家乡父老视为分内之事——“为了家乡做贡献，我也应该的！”(黄如论在捐建的福建江夏学院一期工程竣工典礼上所说。)但纵观黄如论回国21年慈善公益历程，他的捐赠仍展现出显著的个人特点。

黄如论早年曾执鞭树人，创立世纪金源之后，又将“育好人”定位为企业信念之一。在慈善公益领域，黄如论多次大手笔捐助文教事业，捐资兴建了河南省首座文化艺术本科院校——中原文化艺术学院(3亿元)、福建江夏学院(4.6亿元)、福建科技新馆(9亿元)以及五所中小学(合计8.4亿元)，还积极捐助北大、人大等高等学府，在各地设立各类奖学金、奖教金，捐助希望工程。

黄如论将敢为人先的创业风格带入慈善领域，通过改善捐助地基础设施水平、帮扶新农村建设等，将“输血”变为“造血”，帮助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家庭依靠自身努力逐步致富。2008年，黄如论响应云南省政府的号召，一次性捐赠1.816亿元，用于帮扶云南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养老和新农村建设项目，辅助当地逐步构建“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壮有所为”的和谐社会体系。其中的新农村建设项目，通过帮助当地种植核桃树，同步投资核桃油加工厂，达到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随着核桃经济逐渐形成规模，当地核桃的价格也由原来的几元一斤，逐渐提高到每斤25元左右。25元一斤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平均每个核桃的售价，相当于一个鸡蛋。黄如论曾说：“用荒山种核桃，既可以绿化也可以创收，发展畜牧业，畜粪还可以当肥料，制成沼气解决用电，这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初步计算可以解决当地1.2万多人的就业及生计问题。”

陈嘉庚曾提出“上以谋国家之福利，下以造桑梓之麻祯”，这正是闽商长久以来行善助人、报效家国的写照。在闽商中，一个人的事业成就鲜以豪奢炫富来体现，更多是看他是否为人仗义、有担当、助人为乐，懂得回报社会。在这样的地域文化影响下，同持反哺情怀的黄如论与时俱进，将现代公共管理思想与传统慈善捐助结合，为闽商的慈善行为写下新的时代注脚，让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感受到人性人情的温暖。

一分爱的投入，必有一分爱的回报，更有源源不断的爱的传递。在2005年重庆“为了山里的孩子”义演晚会上，一个受过黄如论资助的小女孩儿，得知晚会上能见到他，当天很早就起床，把自己平日舍不得吃的鸡蛋煮好，用手绢层层包裹，放在怀里。从山里到市里一路颠簸，鸡蛋到黄如论手中时，依然是热的。黄如论不止一次感慨：“这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